新周文化丨中國左翼搖滾青年

新周刊 新工人藝術團 2016-11-01

周文化丨中國左翼搖滾青年

2013-10-24昆鳥新周刊

2013年9月8日，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。

文/昆鳥

在為數不多的工人音樂團體中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是個標桿式存在。他們的根據地在靠近首都機場的皮村。在皮村的“新工人劇場”裏，記者見到了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許多，而交談每隔幾分鐘就會被飛機的轟鳴打斷。“這兒能看到各種各樣的飛機，這條是國際航線，那邊是T3航站樓。”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許多介紹說。他口齒不算伶俐，但很懂幽默。

“新工人劇場”充滿了既簡陋又國際化的氣質。幾年前，日本左翼戲劇家櫻井大造在中國演了幾場話劇，走時把帳篷留下了，孫恒、許多和一幫工友以帳篷為中心搭建了一個演出場地。劇場的核心部分是一頂演出帳篷，這裏便成為皮村“工友之家”的“新工人劇場”。

許多與孫恒一樣，是中國左翼搖滾的代表性人物。9月7日晚上11點，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的演出結束，記者正跟許多在皮村的小飯館吃飯，他收到了一條來自一位英國戲劇家的短信，說巴西的文化部長想到皮村看看。本來以為是隨口說說的事情，而9月12號，正在中國訪問的瑪爾塔·蘇普利西真的到了皮村。

“新工人劇場”的聲名大噪是因為崔永元主持過第一屆“打工春晚”。每年在這裏舉辦的“打工春晚”也儼然變成了一個文化品牌，甚至整個皮村也開始具有了象征意義。而現在，“皮村”一詞不僅對中國各地的工人組織有著強大的號召力，國外左翼也對這個地方非常重視。

相比國外，皮村與香港和台灣的聯系更加緊密。

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上，記者見到了黑手那卡西樂隊的團長劉自強，頭上的帽子繡著個格瓦拉，四方臉，看著剛猛，說話隨和。他已經連續參加了幾屆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，而樂隊此次的北京之行，除了參加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的演出，還要受邀為建築工人演一場。

劉自強已經58歲，另一身份是一名機場搬運工，而他與黑手那卡西樂隊已經為工人唱了17年的歌。台灣“解嚴”時，劉自強就加入了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會，直到現在，他的立場都很明確。黑手那卡西的歌曲，很多都是在呼喚工人的覺醒。由於劉自強很早就與孫恒認識，所以孫恒和黑手那卡西都翻唱了韓國“光州事件”時的一首歌曲，歌詞不同，歌名也不同，孫恒的叫《勞動者讚歌》，黑手那卡西的叫《光州之歌》。

“台灣和大陸工人的處境從本質上講沒什麽區別，只是誰被剝奪得更嚴重的問題。他們都處在資本的快速掠奪之中，”劉自強說，“這十年左右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，不僅僅是大陸和台灣，這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。”

在資本自由化的大環境下，劉自強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。他參加過幾次國外舉辦的國際工人大會，也曾和西班牙、韓國等地的工人組織有過接觸，“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”。

2013年9月8日，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。

“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，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。”

為了準備9月6號開始的第四屆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，8月29日晚上，孫恒的住處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正加緊排練。孫恒抱起那把符號性的吉他，上面寫著：“孫恒，為勞動者歌唱”。他背後的墻上，掛著一張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海報。

 今年的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來了三十多個各地的工人組織，白天交流工作，晚上就是演出。

9月6日的節目當中，有小品、朗誦、自己創作的歌曲，也有改了詞的流行歌，武漢的“新晨工友家園”跳了騎馬舞；廈門的“國仁工友之家”自創了一段“三句半”。當晚最出彩的還是許多的小品《誰的自由？》：講工廠保安老李熱烈崇拜自己老板，把老板那本個人奮鬥史翻看了無數遍，工廠拖欠工資，他覺得老板有難處。但最後，老李發現老板想要卷款出逃，而且是多年前一次礦難的在逃礦主。

與那些表現農民工善良、能幹、辛苦的春晚小品不同，在《誰的自由？》中，農民工不再被動地指望城市對自己的理解和接納，他們要起來鬥爭。

藝術節上的工人組織性質各異，文藝色彩較濃的組織不多，所以節目的創作和表演水平不均，“對不起，忘詞了”成了一句常見台詞，也很少見到《誰的自由？》這樣的“抗爭”敘述。

現場的觀眾，大多是各地工人團體的自己人，輪到自己表演，就上舞台。舞台的背景是一副噴繪，一個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抱著吉他唱歌，頭頂上是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的口號：“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，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。”

這是句立意鮮明的口號——工人要有自己在文化上的主體性，擺脫“他者”地位。而就在隔壁的“工友影院”裏，不時傳出陣陣笑聲，那裏正在放一部周星馳主演的喜劇片，幾十個工友正看得津津有味。

與傳統的產業工人相比，“新工人”群體在處境和訴求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別，他們的聲音仍未得到有效的表達。然而，這句口號也反過來凸顯了“新工人”自身文化力量的弱小。對他們來說，傳統的工人文藝作品已經成了過期藥品，除了副作用，幾乎什麽也不剩了。

相隔沒多久的9月20日，首鋼北京廠區有一場音樂會，高唱《社會主義好》和《咱們工人有力量》，票價高達1280，肯定不是給農民工看的。

“新工人文化藝術節”的第二天下午有一個工人團體與幾家媒體的交流會，開場有個報告，總結了近年來媒體對農民工問題的報道情況：對於農民工的報道，一是缺乏工人自己的視角，二是苦情戲多，正面報道工人維權活動的少。在幾家媒體的記者代表介紹了一些引起媒體關註的途徑後，現場很快在主流媒體靠不靠得住的問題上陷入緊張。盡管，主持人蘇湘試圖將交流會從“鬥爭框架”拉回到“對話框架”，但直到結束，都沒能徹底消除這種緊張。

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的王江松明確指出不能指望主流媒體，工人群體應該有自己的媒體戰略，做自己的發聲平台。事實上，這些工人團體很多都辦過自己的小報，目前都是社區性的。北京工友之家有自己的“新工人網”，負責網站維護的曹陽說，有些學者會貢獻一些文章，但也會很謹慎。

他們正在擴大文藝作品在工人當中的影響，但想要取得工人的信賴也不容易。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的黃小娜說，工人很少會主動過來尋求幫助，要吸引工人群體參與，還要想辦法搞一些演出和好玩的活動。黃小娜的丈夫董軍，是重D音工人樂隊的主創，他說：“深圳是個資本文化太發達的地方，你要幫助別人，還不收錢，別人根本就不相信你。”

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總幹事李大君說，工人組織最關鍵的任務是工人教育，喚醒工人意識。9月7日還有一個“新工人杯文化藝術大獎賽”的頒獎儀式，他在給最佳小說《死無對證》的作者曾繼強頒獎時說：“資本家沒有上天堂，也沒有去地獄，他們還在人間，所以大家還需要奮鬥。”

2009年4月25日，圖為孫恒。

“致額們傷痛倔強豪放的青春。”

除了這種每年一度的大型聚會之外，左翼搖滾青年的演出場所經常是建築工地、草坪以及一些工友聚會的場所。但他們現在也能將影響力擴散到城市裏的酒吧。聽者則有知識分子、白領和一些關心工人階層利益的人，甚至也有一些純粹的聽眾。

7月26日，“心，跳在左邊”演出在北京一個酒吧舉辦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許多是拄著拐去的，他剛崴傷了右腳。結尾的時候，照例要唱《國際歌》。“《國際歌》是要站著唱的。”對著台下的觀眾說完，許多先站起來了，腋下撐著拐。打繃帶的右腳顯然沒有影響他的舞台表現力，反倒把主題大大強化了。

這場演出的主題是：“致額們傷痛倔強豪放的青春。”盡管把“我們”寫成“額們”顯得很俏皮，但許多的音樂還是在其戰鬥色彩被充分撩開時把演出推到了總高潮。“團結起來”，在“要創造人類的幸福，全靠我們自己”的歌詞後面，這句口號喊得很有感染力——台下的觀眾都在跟著唱。

演出剛結束，許多就來到售票櫃台，他要看看票房。那天的觀眾不多，二三十個人，其中還有幾個是演出中間穿插朗誦打工詩歌的嘉賓。“來回的路費夠了。”許多說。

“心，跳在左邊”的演出其實從去年就開始了，影響局限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中。杜建國、李昌平等“新左派”學者有時會去捧場。這無疑讓“心，跳在左邊”的左沾染了濃重的“派性”色彩。

在立場問題上，許多並不扭捏，盡管他也承認“中國的很多右派做的其實是左派的事”，但在價值認同上，他還是鮮明地站在了左邊。“首先要明確的是，這裏的‘左’與國家主義、民族主義那套東西無關，主要是要站在底層勞動者的立場。”

演出是許多所在的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發起的。樂隊已經成立了11年，之前並未在搖滾圈裏露面。至少在公眾那裏，更顯眼的是他們的社會學屬性。

樂隊的另一個主創孫恒，他創立“北京工友之家”、辦打工子弟學校、搞“打工春晚”，已經是代表工人發聲的旗幟性人物。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表達，就紮根在孫恒和許多這一系列活動之中。

參與演出的，除了許多還有徐軍和搖滾老炮麥子。在麥子和徐軍的音樂中，幾乎完全找不到政治表達，和國內大多數樂隊比起來，對社會議題的涉及也算是少的。而麥子對演出的命名也有著自己的理解。他說，演出原來的名字是“心跳在左邊”，逗號是他加上的，為的是在語氣上有個強化。但他說完全和左右之爭無關，而是要回到心的本源。他把演出的精神描述為“慈悲喜舍”，對於農民工，更多是一種情感上的關切和認同。“我不是左派，但我看不得人受苦。”麥子說。

許多說，策劃演出的時候，自己確實考慮過，選擇演出夥伴時要找價值觀比較相近的人，但如果從音樂表達的內容上去要求，實在太難找。“我們（新工人藝術團）搞‘心，跳在左邊’的演出，也是想在搖滾圈內產生一些影響，團結圈內價值觀比較相似的人。我們判斷，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與搖滾、民謠會有更多的結合。”

“心，跳在左邊”差不多每隔半月就會演一場，大多是在酒吧，聽眾當中自然沒什麽工人。“中國搖滾的主流市場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，”許多說。

他們必須去尋找真正的聽眾。8月3日，許多帶著徐軍和麥子來到天津工業區，給那裏的工人演了一場。演到半道，電被人掐了。現場沒有燈光，觀眾就用手機電筒給演出者打亮兒，沒有鼓，節奏靠巴掌，沒有擴音器，只能豁開嗓子喊。

 中國搖滾樂從不缺乏底層關懷，但一直以來卻都是一種精英式存在，在面向底層大眾的時候，總顯得比較躲閃，更不用說主動代某個龐大的人群發言。盡管很多樂手和打工者一樣同處城市底層，但搖滾樂手還是會很自覺的將自己區分出來。

“搖滾歌手本來也是生活在底層，但他們一直是‘詩意地棲居’在城市底層，更關心自己的內心。而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，越來越多的人會看到外在的矛盾。”許多說，在美學上的精英姿態和對社會的冷眼旁觀，讓中國很多搖滾歌手在精神上找不到真正的歸屬，也很難從走出自我。他說，2007年前後，很大一批歌手開始信佛，就因為他們無法與社會建立有效的聯系，而現實生活中又找不到出口。

 2013年8月31日，“心，跳在左邊”民謠會現場，圖為許多。

“我必須匆忙趕去做蛋糕，蛋糕像城市般漂亮，而我從未嘗過這甜味……”

從浙江一個小鎮來到北京的許多，學了兩年吉他，開始在街頭賣唱。那時，許多也是這樣“詩意地棲居”著，住在北京的城中村，身邊有很多進城務工的人，卻總是感覺自己和他們沒什麽關系。2001年，許多經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孫恒。

當時的孫恒在一個打工子弟學校教書，與一些“三農”社團聯系緊密，不時會跟著大學生社團去給農民工演出。兩個人認識以後，孫恒去工地唱歌的時候，就常會叫上許多。在工地唱歌，“設備很簡陋，弄根鋼筋棍兒往地上一戳，用鐵絲綁上話筒就唱。”那時候的許多沒想過那麽多，唱的也是自己從前寫的一些反映自我狀態的歌，有時翻唱點民歌，沒有專門面向工人的作品。但建築工人的生活太單調了，有免費的演出看，無論你唱什麽，他們都歡迎。“他們可能並不知道我在唱什麽，有時根本聽不清，但是氣氛非常好。”

漸漸地，許多開始享受這種氛圍，身份認同開始發生轉變，並開始跳出“搖滾青年”的“小我”狀態，有意識地為打工者寫歌。2002年，他給打工者寫了第一首歌，《打工號子》。“那時收容遣送制度還沒有取消，大家在村子裏住著，隨時都可能被抓。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雙手，堂堂正正在生活。這首歌寫的就是他們的吶喊和不屈。”許多說，歌曲的內容變了，在語氣和稱謂上也變了。他不再寫“我”，而開始寫“我們”。

在找到自己的階層歸屬之後，“搖滾歌手”的身份不那麽重要了。在許多看來，作為一個搖滾歌手，自己始終都在屋子裏面，沒有真正的融入社會當中。而他要走出屋子，“從勞動者的視角去看問題。”

2002年的勞動節，他和孫恒等人組建了“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”（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前身），自此，身份的蛻變基本宣告完成。然而勞動者立場並不必然導向左翼，而“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”剛成立，左派很快就撲了過來。”當時找到他們的不僅有新左派，也有自由派。他說，知識界看重的，是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符號意義。盡管意見分歧很大，但大家都想爭取工人的力量。

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獲得明確的政治面相，與孫恒的經歷有關系。在與許多結識之前，孫恒就與被視為“新左派”的李昌平、溫鐵軍等學者相識，在思想上是親近的。另一方面，左翼也一直以工人、勞動為價值基礎。可以說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從成立之初就有著左派基因。

從最早的《天下打工是一家》到最新的《就這麽辦》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已經推出五張專輯。在“新工人藝術團”早期的專輯中，歌曲的內容多是打工者的異鄉經驗，唱他們的苦、累、難，這種表達並不新奇，更值得註意的是另外兩個題材的作品。首先是對打工者的讚美，《勞動者讚歌》和《打工號子》這樣的歌曲。孫恒在《勞動者讚歌》裏唱：“我們不是一無所有，我們有智慧和雙手……我們的幸福和權利，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。”立意落在喚起工人的抗爭意識上，如果唱農民工遭遇的歌曲是怨歌，這首歌已開始向讚歌與戰歌的方向發展。

越往後，此類歌曲在“新工人藝術團”的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，語氣上也越來越堅決。他們開始對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提出質問。《我的吉他會唱歌》中，孫恒還機智地觸碰了國家政策問題：“它不唱誰家又發財致富，也不唱誰摸著石頭渡過了河。”《就這麽辦》中的《怎麽辦？》一曲的結尾，是眾聲吶喊：“團結起來，建立集體，就這麽辦！”

許多在“心，跳在左邊”的演出中並沒有唱這些歌曲，卻有一首充滿戰鬥性的《做蛋糕》：“我必須匆忙趕去做蛋糕，蛋糕像城市般漂亮，而我從未嘗過這甜味……有人在不斷出逃，有人想把船賣掉，而做蛋糕的我們該如何是好……這到底是誰的蛋糕，誰分蛋糕，該如何分它？”許多說，寫這首歌的時候，左派和右派正在關於“做蛋糕”與“分蛋糕”的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，自己的歌的確介入了這場爭論。

上世紀80年代以來，中國搖滾通過解構官方話語中的英雄主義，成功塑造了自己“反英雄”的英雄形象。最讓中國樂迷感到興奮的，是搖滾樂的“對抗”姿態，是它“與社會現實的緊張關系”。許多也認為，搖滾樂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它“與社會現實的緊張關系”，但在許多和“新工人藝術團”這裏，邏輯框架已經從個體自由變成了“階級分析”。

在他的眼中，資本在中國力量太強了，其中有民間資本，官僚資本，還有買辦資本。許多說，中國這些年已經產生了很多新的矛盾，勞動者與資本的矛盾已經切實而嚴重。對許多來說，工人群體的擴大和工人地位降低，是個很難以接受的現象。而孫恒則說得更為直接：“工人的地位現在還寫在憲法裏。”

“為勞動者歌唱”是新工人藝術團明確喊出來的口號，但是創作、演出與作品接受之間，總是存在著嚴重的錯位。許多與孫恒創作的歌曲，在打工者群體中間的傳播並不廣，流行歌曲在打工者群體中仍占據著壓倒性優勢。對於這種錯位，許多認為，除了流行歌曲的影響，長期浸淫在個人奮鬥、成功學這套價值觀之中，思想上也被這些東西牽著走。他說，打工者雖然“幹著最苦的活，心裏想著的一直是當老板”。

但許多對此並不悲觀，“隨著社會階層的固化，工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。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，特別是南方工業區80後、90後的農民工，權益意識和團結的意識越來越強。”所以他覺得盡管“左翼搖滾”只能算剛有了一個萌芽，但社會基礎還是很強大的。